

◎ 翟新菊 / 主编 张建国 / 副主编

锡伯族

文化研究



◎ 瞿新菊 / 主编 张建国 / 副主编

锡伯族

文化研究

XIBOZU
Ji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brary
藏书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锡伯族文化研究 / 张治安主编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
2009.2

ISBN 978-7-228-12272-1

I . 锡… II . 张… III . 锡伯族—民族文化—研究 IV . K284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3842 号

责任编辑 徐晓琳 装帧设计 刘堪海

锡伯族文化研究

张治安主编

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 830001
电 话 (0991)3652361
印 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1/32
印 张 9.75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400 册
定 价 28.00 元

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辽金锡伯族先民 | 佟克力 | 001 |
| 锡伯族的萨满教与祖宗崇拜 | 苏德善 | 014 |
| 锡伯族萨满神歌的历史特征及旋律构成 | 韩育民 | 018 |
| 锡伯族萨满歌的口头传承研究 | | |
| ——以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为例 | | |
| | 赵洁 | 037 |
| 新疆锡伯族妇女生育习俗与生育观 | 赵琴琴 | 049 |
| 锡伯族的“喜利妈妈”及其生育观念 | 马志华 | 061 |
| 锡伯族的丧葬礼仪 | 佟加·庆夫 | 070 |
| 论锡伯语的源流问题 | 余吐肯 | 078 |
| 论锡伯文和满文的源流关系 | 余吐肯 | 093 |
| 锡伯族民间文学简介 | 贺灵 | 110 |
| 锡伯族作家郭基南创作述评 | 吴孝成 余吐肯 | 128 |
| “路途有多远，我们还不知道” | | |
| ——傅查新昌作品散论 | | 安德海 142 |
| 牛录的守望者 | | |
| ——略谈阿苏和他的诗 | | 贺元秀 夏雨 155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新疆锡伯族新闻事业发展现状 | 张 莉 | 160 |
| 锡伯文《察布查尔报》的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 | 王 飞 | 172 |
| 时代的旋律 民族的心声 | | |
| ——锡伯族歌曲《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》创作经过 | 余吐肯 韩育民 | 185 |
| 锡伯族的舞蹈 | 贺 灵 | 198 |
| 论图伯特的历史贡献 | 余吐肯 | 202 |
| 简论喀尔莽阿 | 苏德善 洪 坤 | 214 |
| “察布查尔”考辨 | 舒穆尔·德善 | 225 |
| 汉文化对锡伯文化的影响初探 | 何坚韧 | 236 |
| 锡伯族女子教育探析 | 葛丰交 孔淑瑞 顾梅林 | 249 |
| 锡伯族研究概况 | 房建昌 | 271 |
| 锡伯族研究扫描 | 葛丰交 | 276 |
| 文献索引 | | 284 |
| 后 记 | | 308 |

◎辽金锡伯族先民

佟克力

辽金时期是鲜卑系统遗族进一步分化、组合并向部族转化的时期。鲜卑系统之室韦遗族先后处于辽金的统治之下，在女真统治的近120年间，锡伯部族渐渐形成。

在隋唐时期，室韦名目繁多，分布广泛，据《旧唐书》记载就有二十余部。但到辽代，史籍所述名称“室韦”者仅有黄头室韦、黑车子室韦和臭泊室韦，其他近二十部均消失于史籍。这并不是史官之疏忽，而是确切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。证明鲜卑系统之室韦遗族顺乎地理条件和政治、军事形势，多数部落各自与别的部族融合，踏上了不同民族的形成道路。但这一时期，仍有一部分室韦以部落名称自居，出现于辽代史籍。

关于契丹，史学界已有长期研究，肯定了他们是东胡系鲜卑遗族，与室韦等同宗共祖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，在契丹建立辽朝之前，为适应其扩张之心，开始了掠夺和征服邻近部落的战争。早在遼撝中期以后（8世纪下半期），不断进行对外掠夺战争，俘掠了邻族大批牲畜和人户。如在鲜质可汗时，征伐其西南之奚，“俘其拒敌者七百户，掠其降者”。^①阿

保机的父亲，撒刺的为部落酋长(夷离堇)时，又俘奚七十户，押回契丹本土“饶乐之清河”。^②到了撒刺的之弟迷瀾为夷离堇时，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掠夺战争，他“北征于厥、室韦，南略易、定、奚、霫”。^③到遥辇氏最后一个联盟首领痕德堇可汗时期，“乘中原多故，北边无备，遂蚕食诸郡，鞑靼、奚、室韦之属，咸被驱役，族帐寢盛，有时入寇”。^④上述说明，在契丹建国之前，就有部分室韦已臣服于契丹，但其依附关系并不是很牢固的。

唐昭宗天复元年(901年)，契丹遥辇氏最后一个可汗痕德堇初立，耶律阿保机被推为夷离堇以后，他担任了对外征讨的军事统帅，开始了阿保机开国前夕的征服四邻的战争。对这一段时期的征邻战争。如《辽史·太祖纪上》载道：

“……时小黄室韦不附，太祖以计降之。……唐天复元年，岁辛酉，痕德堇可汗立，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，专征讨，连破室韦、于厥及奚等部，俘获甚众……明年春，伐女真，下之，获其户三百。九月，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。……明年岁甲子，三月，广龙化州之东城。九月，讨黑车子，室韦，唐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发兵数万，遣养子赵霸来拒。霸至武州，太祖谋知之，伏劲兵桃山下。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酋长所遣，约霸兵会于平原。既至，四面伏发，擒霸，歼其众，乘胜破室韦。明年七月，复讨黑车子室韦。……(神册元年)二月戊午，以从弟迭剌底为迭烈府夷离堇。是月，征黑车子室韦，降其八部。……冬十月乙巳，讨黑车子室韦，破之。……(二年)夏五月癸酉，诏撒刺讨乌九、黑车子室韦。”

上述提到的“小黄室韦”、“室韦”和“黑车子室韦”，是契丹对散居异地的室韦各部的不同称呼。所谓小黄室韦是“突

“吕不室韦”部分之一，又称黄头室韦。辽建国前分为大、小二黄室韦。在《辽史》及其他辽代史料中有时分别称“大黄室韦”、“小黄室韦”、“黄室韦”，有时则称“突吕不”或“突吕不室韦”。至于“室韦”，没有确指，但据其他记载分析，可能是唐代史记室韦之“达姤部”或洮儿河以南之室韦部。“黑车子室韦”的处所较明确，他们是唐代塞曷支室韦与和介室韦同突厥结合而形成的室韦。他们于辽建国前后就已向西南迁徙，即辽上京西北地区。他们与后来的锡伯族没有联系了。

臭泊室韦在辽代也是个较强的部落之一。在隋唐及以前的各朝文献中并没有这个称呼，说明它是辽代才出现的新名称。从“臭泊”之字面上看，它是辽统治阶级对该部落的蔑称。如果是根据居处环境所起的名称，那么他们是处在湖泊、沼泽地带的部落，但是，据白鸟库吉考证认为，臭泊室韦是《辽史》之阻卜、《金史》之阻韁。^⑤他的这一论断若成立，那么“臭泊”者当系蔑称无疑。关于阻卜的活动范围，据《辽史》可知，北起克鲁伦河、土拉河下游，鄂尔浑河上游，南至辽边（今内蒙昭乌达盟西边、锡林郭勒盟南边和乌兰察布盟阴山山脉一带）以及西夏以北（今外蒙南边），西南到新疆东北边流沙以东的广阔地区都是他们的分布区域。在这一地带并无“臭泊”可言。有些学者据“锡伯”与“臭泊”音相近，认为锡伯即臭泊（室韦）的同音异写。^⑥究竟这一说法有无道理，待进一步考证。

《辽史耶律曷鲁传》载：“太祖为达马拏沙里，参与族事，曷鲁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。”《契丹国志·太祖后传》亦载：阿保机“尝度碛党项，留述律后守其帐，黄头、臭泊二室韦乘虚掠之，述律后知之，勒兵以待其至，奋击大破之，由是名震

诸夷”。这说明,辽初的黄头室韦是一个强大的部落,他们对契丹时叛时附。阿保机对黄头室韦进行了数次武力征伐。根据《辽史本纪》中之诸多记载看,黄头室韦主要活动于嫩江以东地区,辽代属东京道辖。

黄头室韦即突吕不室韦部,与涅刺拏古部同。《辽史·营卫志下》载:“突吕不室韦部,本名大、小二黄室韦户。太祖为达马拏沙里,以计降之,乃置二部。隶北府,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,戍泰州东北”;“涅刺拏古部,与突吕不室韦同,节度使戍泰州东”,有人对“涅刺拏古”作了考证,认为他们也是黄头室韦。^⑦在辽代他们主要在嫩江以东活动,但到金代,形势又发生了变化。

在辽代,室韦除黑车子、黄头、臭泊等部外,还有一些以部落名称自居,如乌古部、女古皮室等。从《辽史》记载看,乌古部属辽上京道乌古迪烈统军司辖。《辽史·地理志》载:

“泰州,德昌军,节度。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。因黑鼠族(黑车子室韦)累犯通化州,民不能御,遂移东南六百里来,建城居之,以近本族。黑鼠穴居,肤黑,吻锐,类鼠,故以名。州隶延庆宫,兵事属东北统军司。统县二:乐康县、倚郭,兴国县。本山前之民,因罪配递至此,兴宗置县,户七百。”

有人考证认为,上述“二十部族”系指辽属部乌古迪烈部。^⑧其实,乌古和迪烈是两个部落,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看,乌古和迪烈分别疑为唐代的乌罗护部和那礼部。在唐代那礼在北、乌罗护在南处,在雅鲁河以及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;从语音上比较,乌古与乌罗护,迪烈与那礼又非常相近。辽代前后,处雅鲁河流域的那礼部有可能越大兴安岭向蒙古高原迁徙。而乌古部的一部分西越大兴安岭,一部分仍游

牧游猎于绰尔河、洮儿河流域等地。这一部分乌古室韦成为今天锡伯族的主要部分。

乌古室韦部在辽建国前就与契丹有往来关系，但这种关系不是很牢固。辽建国前后，乌古与辽的关系一度表现出叛附不定。如《辽史·太祖上》载：辽太祖“九年（915年）春正月，乌古部叛，讨平之”。这说明，在此之前乌古便不同程度地臣服于契丹。又如《辽史·太祖下》载：“（神册四年）九月，（太祖）征乌古部，道闻皇后不豫，一日驰六百里还，侍太后，病间，复还军中。冬十月丙午，次乌古部，天大风雪，兵不能进，上祷于天，俄顷而霁。命皇太子将先锋军进击，破之，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，牛马、车乘、庐帐、器物二十余万。自是举部来附。”乌古部这一次虽举部来附，但以后又有叛附不定的现象。因此，辽统治者利用黄头室韦又讨伐乌古室韦。如天显三年（928年）“秋七月丁未，突吕不献讨乌古捷。……九月己卯，突吕不遣人献讨乌古俘……（四年）六月丙午，突吕不献乌古俘。戊申，分赐将士”。^⑨上述说明，绰尔河、洮儿河等地的锡伯族先祖，当时并没有屈服于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的武力征伐，但受到了阿保机的残酷镇压。因此，阿保机在锡伯族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至今把他的名字当作恐怖物，来恐吓哭闹的幼童。^⑩但经过数次征伐，乌古室韦最后还是完全臣服于辽朝。

辽统治者平定绰尔河、洮儿河流域室韦之后，在此设立了泰州军政重镇，以控扼北方地区。从有关资料记载看，泰州是古代控扼北方地区的喉道，自辽开始一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辽统治者在此设立重镇，其目的—是从军事上阻止北方各部族的南犯或东侵。从《辽史·地理志》记载看，黑车

子室韦曾不断侵掠过泰州；二是从行政上对北方各部进行管辖。

辽代泰州是军政合一的重镇，属上京道，为东北统军司驻地。具体州治在今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古城（清称之为“绰尔城”，见《大清一统志》、张穆《蒙古游牧记》）。该城土筑，呈正方形，周长4562.8米，配有东西南北四个瓮门，城垣之外环以两重护城壕，西南郊外原曾伫立六角密檐实心砖塔一座。城内出土的“大安七年”刻石，上有“泰州河堤”字样，并载录了47个汉族人姓名，证明至迟11世纪末，就有相当数量的汉族居住在黑龙江地区。辽泰州前身为通化州。^①在辽政权还未巩固前，辽军和晋军曾在泰州发生过数次激战。如会同八年（945年），晋杜重威、李守贞等率军深入到绰尔河流域，连下泰州、满城，打败契丹援兵。后来辽调重兵才将他们打败。^②11世纪初，辽统治者大肆侵掠北宋，引起辽宋数年刀戈相对，因此，辽宋在泰州也曾多次刀戈相见。^③到辽末天祚时，新兴的女真为了从辽手中将控扼北方诸部的大权夺过来，也把泰州作为主要攻击对象，结果天庆七年（1117年）春正月，“女真军攻泰州，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，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，复下泰州”。^④以上说明，绰尔河、洮儿河等地的锡伯族先祖（乌古），在辽代因处军事要地，一方面为辽扼守重镇，防范外部入侵；另一方面经常受到战火洗礼，培养了他们勇敢善战的民族性格。

辽道宗寿隆初年，辽统治者将乌古迪烈部徙于乌纳水（一说为今海拉尔河支流乌诺尔河，一说为免渡河上游乌纳尔河），以扼北边之冲。^⑤

女古皮室者，也是室韦的一部分。“女古”为大、小二黄

室韦部，“皮室”是黄头室韦部。^⑨据《辽史》和《金史》记载，女古皮室是比较强大的部落，活动范围较广，对辽政府时叛时附，有时又帮辽平定其他部落。他们作为黄头室韦部的一部分，在以后的发展中，与锡伯族源也有很大联系。

辽代中后期，分布于南起鸭绿江、长白山一带，北至黑龙江中游，东抵日本海的女真很快发展起来，逐渐成为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据《辽史》，辽代中后期，契丹与外部的主要往来关系，除北宋外，就是女真。女真利用辽朝对他们的友好关系以及中原的经济、文化往来关系，加速发展自己的势力。从辽天庆四年（1114年）始，女真与辽争夺势力范围，他们与辽的矛盾已不可调和。天庆五年（1115年）正月壬申，女真杰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继位，国号大金。同年十二月，金兵大败70万辽军，致使辽统治下的“契丹、奚、汉、渤海系辽籍女真、室韦、达鲁古、兀惹、铁骊诸部官民”，^⑩纷纷归顺金朝。绰尔河、洮儿河流域的室韦（锡伯），自天庆七年（1117年）金军陷春、泰等州以后，大部分已归服金朝。天辅五年（1121年），完颜阿骨打由于军供的需要，下令“摘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，屯田于泰州”（即锡伯族聚居区）。^⑪使锡伯族聚居区成为金初重要的屯垦区之一。保大二年（1122年），金陷中京、泽州、北安州等。次年，由于金兵压境，辽帝入夏境。耶律迪烈等劫天祚帝北奔，立为帝，不久死。保大四年（1124年），夏称藩于金。耶律大石率所部西走，自立为王，建西辽。天祚帝出夹山反攻金军，金军大败。次年，天祚帝奔党项，趋天德军。接着，天祚至应州，被金兵俘获，辽朝最后灭亡。

女真的先世，最早是以肃慎的名称出现于史籍，以后又分别以挹娄、勿吉、靺鞨出现在历史。西周初，肃慎接受周王

室的册命,^⑨朝贡“楛矢石砮”。^⑩这个时期,肃慎具体居何处无籍可考。汉代以后,肃慎之称为挹娄所代替,才有其方位的记载:“挹娄,在夫余东北千余里,滨大海,南与北沃沮接,未知其北所极……古之肃慎氏之国也。”^⑪据此,挹娄西到达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处,北及今鄂霍次克海与日本海。至晋时,肃慎西伸到长白山(不咸山)北,与高句丽接壤。后魏时,勿吉强大,逐夫余,占有夫余南部(今东流松花江南),并进入第二松花江及辉发河流域。靺鞨是勿吉的继续和发展。有粟末、伯咄、拂涅、安吉骨、号室、黑水、白山七部,分布在东流松花江南、黑龙江下游(包括中游一部分)南北、牡丹江、乌苏里江、第二松花江流域。渤海是靺鞨中较先进的部分,是以粟末靺鞨为主吸收其他族人重新融合而成的渤海人。在唐代其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发展很快,并建立了地方政权。

自五代始,靺鞨改称为女真。女真人原出自黑水靺鞨,早在唐灭高句丽时,靺鞨即分散迁徙,后渤海强盛,黑水靺鞨的一部分役属于渤海,辽灭渤海后,把渤海人大批南徙,黑水靺鞨也乘机向南移徙,契丹称这些黑水靺鞨为女真。辽代,女真的活动范围,南起鸭绿江、长白山一带,北至黑龙江中游,东抵日本海。契丹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又把女真划分为“熟女真”、“生女真”和“回跋女真”。熟女真在契丹之南,隶契丹籍,并且一部分人与契丹杂居,其经济文化较发达;生女真在北不隶于契丹籍,其经济文化较落后,辽时仍处于游猎、游牧的生产形式;回跋女真处在熟女真和生女真中间,即南北之间。自辽中期,生女真的完颜部势力开始强大,到辽丰联合其他各部与辽争衡,金初,其统治者在东北,基本上沿袭了辽时的行政和组织形式。到熙宗时,按辽宗旧制进行改

革,统一制度和确定全国的区域划分,设京、路、府、州、郡县,但在地方仍然保留了州县与猛安谋克并存的状况。此外,还局部地保留了部族的组织形式。

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锡伯族聚居区属临潢府路。辽时,临潢府地为上京,金初因称之。天眷元年(1138年)改为北京。天德二年(1150年)改北京为临潢府路。天德三年罢之。贞元元年(1153年)以大定府为北京路后,仍置北京临潢路提刑司。

金正隆四年(1159年),契丹等发动反金起义,接着金用兵相继镇压。金统治者在平定契丹等的起义后,于大定三年(1163年)解散了所有曾参加起义的契丹猛安、谋克,将其原管户口分散到女真的猛安、谋克中去。至大定十七年(1177年),又解散了其余的契丹猛安、谋克,将其原管户口(主要为契丹)徙置临潢、泰州、济州及乌古迪烈部(金时多写成乌古里石垒部)等处,令其耕作,也与女真人杂居。同时,金统治者又向各主要地区徙女真人,以监视各部族。毫无疑问,从此时起,在绰尔河、洮儿河等地锡伯部族聚居区,不仅有了不少契丹人徙居,而且也有了女真人杂居。其中的契丹人,随着契丹之称的消失,逐渐融合到锡伯部族之中。

在金代,聚居于绰尔河、洮儿河地带的锡伯部族,同绰尔河以南、嫩江以西的其他部族(部分蒙古祖先等)仍被统称为乌古里石垒部(即乌古迪烈部),关于其历史演变,上已提及。据史料记载,金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东北各部族的管辖及解决粮食供给问题,加强了对绰尔河下游的泰州及洮儿河等地区的屯垦实力,同时又加强了军事防守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载:“泰州,德昌军节度使。辽时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,海

陵正隆间(1156~1161年),置德昌军,隶上京,大定二十五年(1185年)罢之。承安三年(1198年)复置于长春县,以旧泰州为金安县,隶焉。户三千五百四,县一,堡十九。”从此,泰州有了新旧之分,泰州治所由绰尔河流域南迁到洮儿河流域的长春县(辽长春州故址),而改旧泰州为金安县,隶于新泰州之下。关于迁泰州及总其名称等问题,有人提出:大定二十五年(1185年)时,北方边境宁谧,且金统治中心早已由“内地”移到中都大兴府(今北京),此地随之萧索,所以撤销了节度使的建制,但这一时期的名称还应称作泰州。至承安三年(1198年)因北方蒙古兴起,金朝北境形势紧张,又恢复了泰州德昌军节度使的建制,但却后撤一步,迁至长春县(辽长春州故址),而改旧泰州为金安县,隶于新泰州之下。^②金迁泰州及其总名称问题,对当地锡伯族的社会生活及其经济、政治发生了什么影响,由于缺乏资料记载,很难做出评论。但是,有一点可以肯定,如果金迁泰州之后,锡伯部族仍然活动于绰尔河等地,那么他们与金统治者的关系必定有所松弛,而与新兴的蒙古部族有了进一步接近,如果锡伯部族随泰州转移到了洮儿河流域及以南地区,那么他们与契丹和女真族的关系更加密切。在锡伯文化中,这时就大量注入了女真文化成分。以上假设哪一个接近事实,待后进一步研究。

在谈到金代锡伯族活动地域及活动情况时,还可以从乌古迪烈与黄头室韦的关系进一步佐证。据《辽史·天祚帝纪二》:天庆七年“春正月,女真军攻泰州,东西面诸军不战自溃,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,复下泰州。”此事在《金史·杲传》也有载:“天辅七年杲以兵一万攻泰州,下金山县,

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来降，遂克泰州。”女古皮室或女固脾室是同一族，就是黄头室韦。^②王国维认为：“按女固脾室皆迪烈分部之名。《地理志》部族节度使中有迪烈女古部，《辽史·天祚纪》书保大三年敌烈皮室叛，此女固脾室，即女古皮室也。”^③在金代，将黄头室韦开始称为黄头女真。据《松漠纪闻》卷上载：“黄头女真皆山居，号合苏馆女直。……疑即黄头室韦也。……因避契丹讳，遂称黄头女真。”这里所称“合苏馆”即锡伯、满语之“hashan”，意为“藩篱”，喻指门户屏障，是守边者。

金统治者把黄头女真（黄头室韦）也编入了军队，并称“硬军”。如《松漠纪闻》卷上载：“金人每出战。皆被以重礼，令前驱谓之硬军。”金统治者对黄头女真的高压政策，也遭到了他们的反抗，如《松漠纪闻》又载：金统治者对黄头女真“役之益苛，廪给即少，遭卤掠所得，复夺之，不胜忿。天会十年（1132年）遂叛，兴师讨之，但守遏山下，不敢登其巢穴，经二年出斗而败，复降”。

辽金统治者对东北各地部族的称呼变化多端，无论从族属上，还是从地域上，都不能作为确指、确定的概念使用。因为这时期部族的流动性很大，也很频繁，尤其是嫩江流域的各部族更如此。因此，黄头室韦（黄头女真）的概念也很广泛。但其中一点可以肯定，当时绰尔河、洮儿河流域的锡伯族也被称为黄头室韦或黄头女真。

辽金时期的锡伯文化呈现为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相结合的类型。当时的锡伯部族多数仍然游牧、狩猎，少数城居，从事农业。据史料记载，辽金时期，绰尔河、洮儿河流域是两朝重要的屯垦基地。两朝统治者令其周围部族垦荒屯种，以

解决军需。但由于战争和改朝换代时所带来的社会动荡，其农业生产遭到多次破坏。因此，在这一时期，农业文化始终未能在锡伯族部族中真正确立。

辽金时期锡伯部族文化，由于缺乏资料，不能大书特书，而只能通过对契丹和女真文化的记载，析出与锡伯部族相同或相近之处加以论证。

到了金末，锡伯部落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变化，已形成为锡伯部族，并开始向民族门槛迈进。在辽金，或者更早的时代，锡伯部落或部族，为何未与契丹、女真融合，也未加入蒙古形成的行列，这和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，即大兴安岭把他们和蒙古部族隔开；嫩江把他们和女真分开；洮儿河和辽河又把他们与契丹本部进行了分割，使其各自步向了不同民族的发展道路。

注释：

①辽史·营卫志下。

②辽史·太祖纪上。

③辽史·太祖纪下。

④旧五代史·契丹传。

⑤白鸟库吉.室韦考.(五)，载《史学杂志》第30号第7篇，1919年7月。

⑥赵展.锡伯族源考，载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2年第3期，肖夫《锡族简史》第10—11页，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。

⑦冯继钦.辽金时代的黄头室韦，载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5年第1期。

⑧孙秀仁.再论绰尔城(塔子城)历史地理诸问题.载《求是学刊》1980年第4期。